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胡秋原著



一八四一年表現西方船堅砲利大敗我國
水師英國輪火艦輪報應號(Nemesis)號

學術出版社出版

書叢知識現代

胡秋原著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學術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臺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再版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八四八號)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定 價：新臺幣柒拾伍元

著 作 者：胡

秋

發 行 者：學 術 出 版 社

總 經 銷：文 圖 書 公 司

臺北縣新店中央新村五街十一號

電 話：九一一二〇四八

郵政劃撥四八七六(中華雜誌社)

總 經 銷：文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號

電 話：三一一九六八三

印 刷 者：慈 明 電 打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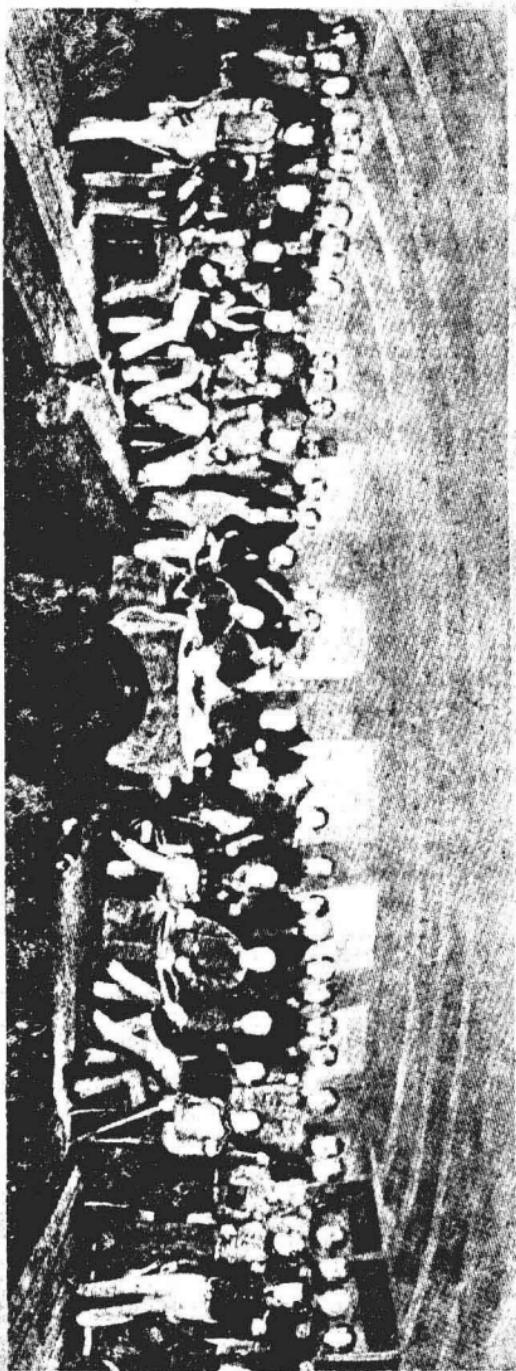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七十三號二樓

電 話：七〇八一四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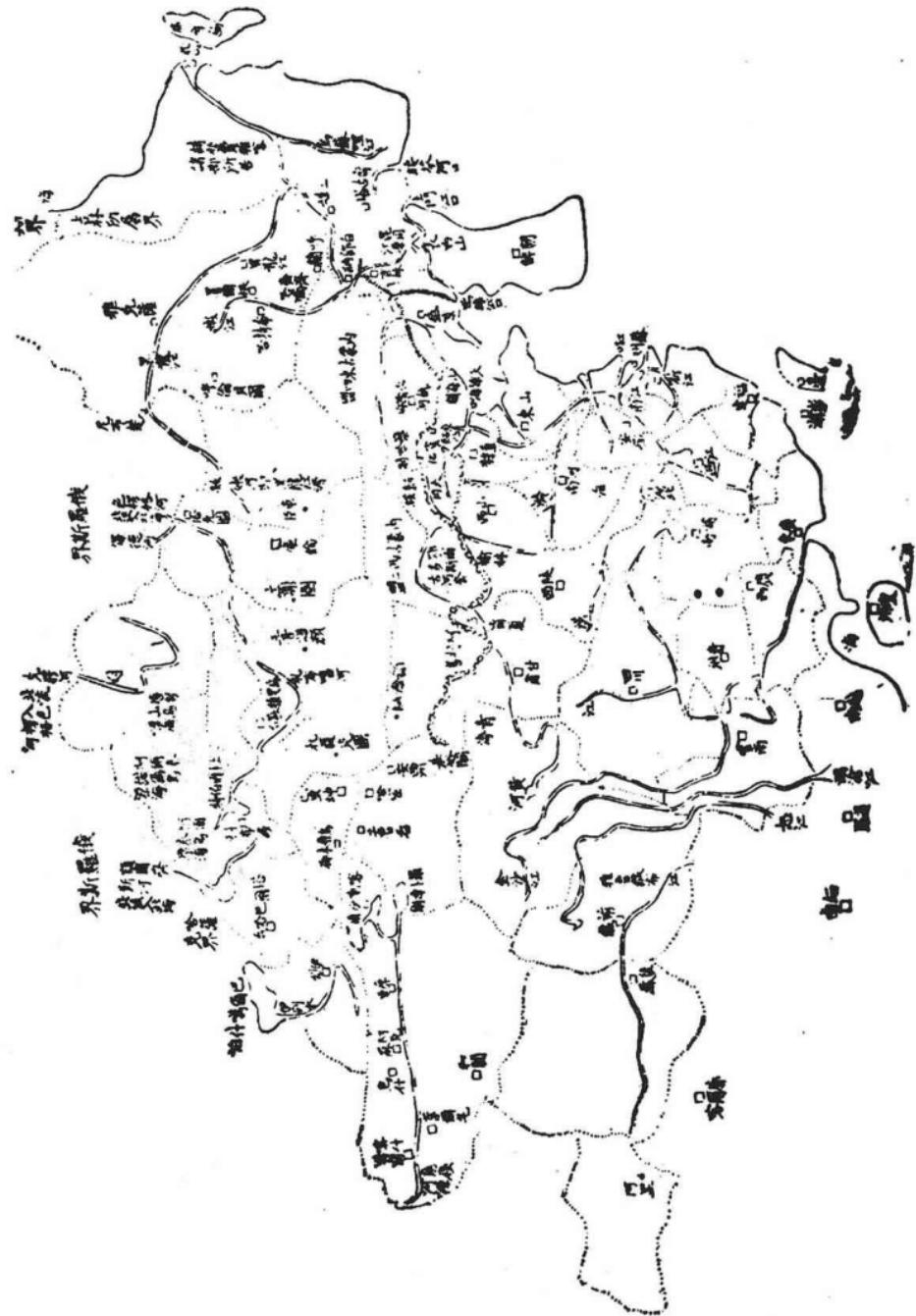
版 權 所 有 究 必 研

圖 約條京南訂簽查鼎璣與英耆

(自 Lanin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圖全與皇乘備方朔壽壽何自) 圖地國中未光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do.com

再版附記

此書在台灣影印出版後，我覺得字跡不甚清楚，現在再版，另行打字重印。內容則無變動。

此書重印後，值得一提者，有下面有關的事。政府遷台以來，未嘗紀念七七。結果，中共宣傳抗戰是他領導的；而民國六十一年日本承認中共，也對中共道歉，並對我宣布廢止中日和約和絕交，卻又要繼續文化經濟交流，而我朝野亦接受之。結果，美國人要實行「日本模式」。我想這一本戰時所寫的小著，可以證明中共之謊言及日本之無恥。然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如昔日外交之失敗，由於愚弱，今日之失敗，則又在四維之不張也。

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 胡秋原識

胡著「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序

由於濫竽大專中國近代史講席十餘年，我深深感到一般青年學生對近代史知識之模糊與缺乏，至堪驚人，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小而言之，如把鴉片寫成鴨片，和珅寫成和坤，王鑫寫成王鑑，嘉慶誤爲嘉靖，東學黨誤爲東林黨，以及咸豐十二年，同治十四年之類；大而言之，對有清一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八旗和綠營的兵制，取士用人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及相關的若干專有名詞，幾乎是茫無所知。至於自鴉片戰爭以還，若干內憂外患的慘痛史實，能够聯貫起來，分析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指陳得失，明辨是非，說得不太離譜，而且層次分清，時間不致倒置，那更是絕無僅有。這較之三十年代普通中學生所能了解者，其相去之懸殊，是不可以道理計的。

試問國家處於屢年憂患之中，生而爲中國的讀書人，竟不了解中國歷史盛衰之關鍵，已覺可羞，乃至生而爲近代中國的智識青年，竟不了解近代中國歷史積弱之癥結所在，反而要跑到國外去，向素來不利於中國的所謂「中國近代史權威」洋教授請益，以致被牽着鼻子走，漸失本真，面目全非，乃至忘却民族的自尊，跟着胡兒罵中國，這不能不說更是無比的羞

恥。如此年復一年的下去，我們的國家民族觀念，如何能在下一代智識青年中生根？又如何能向每年大量湧出國門甚而一去不復返的留學生羣中，喚回其日漸消失的「國魂」？更無怪乎有若干民族渣滓竟忘却本身同是炎黃子孫而要在海外搞什麼「臺灣獨立」運動了。這一切的一切，俱足證明我們的歷史教育的嚴重失敗，還不值得警惕嗎？

我嘗推原歷史教育失敗之故，固由於一些官封「白牌教授」本身之不求甚解和教學不得其法，而缺乏合乎水準的教材，也是重要的因素。即以李劍農先生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而言，是大家公認的一本好書，迄今尚無有出其右者，可惜重點偏在政治史的一面，而時間又僅敍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為止，對於近百年來外力的侵入，造成國勢不振，由排外到畏外、媚外，由妄自尊大到妄自菲薄之由來與經過，似未能一貫的予以扼要說明，尤其二次大戰前後，日俄之交相侵逼、漢奸、共匪之裏應外合，使國家遭遇歷史上瓦古所未有之一大變局，這中間許多重要史實，在李書中都付闕如，未能及時增入，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

今年春間，偶然從舊書攤上買到胡秋原先生一本大著「近百年來中外關係」，是抗戰勝利前二年在重慶出版的，完全土紙印刷，令人想念抗戰艱難的陳跡。我曾將這本書詳閱一過，其內容始於中英江寧條約，終於中英美平等新約。將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為時一百年的

中外關係，分爲十五章，提要鉤玄，條分縷析，予以系統的敍述。除首尾兩章外，每章之末，均有評論，這完全是司馬溫公寫資治通鑑的筆法，不僅可以看到胡先生對每件史實精闢的見解，而且與我平日講授近代史時的重點發揮，有甚多的暗合，可謂先獲我心，大有「相見恨晚」之概。我覺得這本書正好可以彌補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之闕失，而且應該兩者合觀，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將是入門的階梯，而不致迷失路途，茫無所歸，因而懇請胡先生重印，以廣流傳，胡先生經過考慮，甚以爲然，終於接受我的請求，私衷是極感欣幸的。

胡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即已馳騁文壇，名震公卿，而且語驚四座，當者披靡，往往下筆萬言，不能自休。一生寢饋於文、史、科、哲的研究，博極羣書，含英咀華，等身著作，千秋事業，遠非今日欺世盜名的所謂「學人」、「院士」、「講座教授」之流，所能望其項背。即如胡先生在這本書的臺灣版自序中，指陳中國悲劇之由來，是百年來洋人壓力和自身愚弱的後果，而我們受外力的壓迫，却求出路於「西化」與「俄化」，以致形成兩種錯誤的外交觀念，因應失宜。胡先生並且認爲「他們的錯誤，乃根本不曾對世界歷史與文化作比較研究，不知中國與世界變化之由來，不知中國失敗之過程。他們根本無力由洋人的『觀念侵略』解放。西化派只知西洋文化之成就，而不知其勢利主義與弱點，因而奉西洋爲神明；而俄化

派能蔑視西洋，可是其本領又只能對蘇俄和馬列下跪。」這真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之談，像現在挾洋人以自重，遇金圓而低頭甚而徘徊於雙重國籍之間，左右逢源的「學人」、「院士」、「講座教授」者流，縱能有見及此，又怎敢出諸其口。我一向是徹頭徹尾贊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國家主義者，對標榜書生從政而實則登龍有術的如像蔣廷黻之顛倒是非，貶林則徐而揚琦善，故意爲屈辱求和者張目；王世杰之庸妄無知，竟以「美蘇橋樑」自居，締結中蘇友好條約而貽禍迄今，素來嗤之以鼻，認爲與五四時代的曹陸章相去無幾，至多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不過有幸有不幸而已。故我對於胡先生的基本觀點，能够力排衆議，保持史家的獨立見解，是表示由衷敬佩的。

近四十年來，胡先生無疑是國內有數的博學之士，他的著譯數十種，無一不是嘔心泣血之作。其行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並且挾有風雷先聲奪人之勢。因之，一些平生僅能寫幾篇不通的文章，或是抱着陳年的斷爛講義，而可以「審議學術」的南郭先生們，一遇到胡先生的批評指摘，無不以「龜縮」代替答覆，這便是學問眞偽的考驗，也充分證明當前學術文化界的「虛脫」和「貧乏」。不僅如此，更由於胡先生研究的方面多，範圍廣、文、史、科、哲，無不涉獵，又無不精湛，故他的文章，有如山珍海味，百看難陳，供你咀嚼品嘗。而這本「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則好似一盤精緻的美點，讓你百吃不厭。這決不是我的偏嗜，

相信讀者看過這本書後，就知我言之非虛。胡先生寫這本書時，尚是三十四歲的壯年，如今已逾六旬，仍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然其寄望於後起者，亦至爲殷切，假若好學深思的青年朋友，能因此書而有所啓迪，知所奮發，不再蹈襲「西化派」「俄化派」的錯誤，堂堂正正的盡其每個炎黃子孫應盡的責任，則就是區區寫這一短序的微意了！

沈雲龍

五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太平洋區少棒中國隊初勝菲隊之時

臺灣版自序

這一本「近百年來中外關係」寫成於民國三十二年初夏，即日本降伏前二年又三個月。所說之事，始於中英江寧條約，終於中英美平等新約（一八四二—一九四三），適為一百零一年。這一本書，由中國文化服務社於抗戰六週年之際在渝初版，後在渝在滬，疊經重版。赤奸僭號以後，我隻身出走。藏書及所寫書文片紙無存。這一本書偶然在香港找到，携來臺灣。有時我想到將他重印，但又念宜將以後之事補述，並對全文加以修正；而又因要寫的書文尚多，實無暇及此；置書堆中者將二十年矣。

今年春天，沈雲龍先生對我說，他在此處找到這一本書，並認為對中國近時內外之事有甚簡要敘述，是一本很好的近代史入門書，應予重印，並願代為重印。我說，我還打算加以補充。他說此書可以單行。由於沈先生是近代史專家，而如此鼓勵，同時也由於我今年也有將數十年來著作整理一番之意（此是我十年前曾經開始之事，嗣以小人干擾而不果），才將此舊作再看一次。看後亦以沈先生之意為然，因為其中根本觀點固無改變之必要。於是將原書影印出版，只就原書更正若干文字上排印上的錯誤，並增加這一篇序文作若干補充說明。

我先要說明的，是我所說至今沒有改變必要的我的根本觀點，這一觀點，是與我寫書當時流行的見解相反的，而我這本小書，也可說是爲辨正當時流行的見解而寫的。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如何應付西方列強的壓迫和侵略，以謀國家之生存。在清朝，一般官吏和士大夫，以及許多青年，曾經作過許多努力，這努力可總名爲「洋務」運動。一切洋務運動歸結到廢科舉，興學校，成立中華民國。然民國成立以後，在國內方面，政權歸於袁世凱，他是爲抵禦外侮而負責小站練兵的領袖，也便是「洋務」的嫡傳。在國外方面，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洋之勢已衰，無力繼續侵略中國，然日本代之而起，而此東洋侵略者較西洋更爲猛烈，而也是西洋侵略的副產物。袁氏叛國和日本侵略，引起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愛國心是人類都有的，但到了五四，才有一個國民運動，亦即全民性質的愛國運動。自此中國民族運動進入一新的時期。由於中國民族運動有全民的後盾，其力量是巨大的。中國民族運動在每一時期都有其實際的對象，實際的目標，而這目標，都基於一種文化思想上的看法；因爲外侮總由中國傳統文化不能應付當代世界壓力而來。不幸我們要求民族之獨立，然而缺乏獨立的精神。我們受西方的壓迫，却求出路於「西化」。一切洋務運動都是西化運動。經過五四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呼聲，國人的努力在實際上集中於

反日、國權之恢復以及統一的國民政權之建立，可是在思想上則依然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五四時代之「科學」「民主」，表示西化思想之高潮。然而這時候，世界的形勢和思想更複雜了。一方面，日本起來，過去不可一世之西洋諂媚日本以圖保全他們在華特權；另一方面，蘇俄在革命後以反對西洋為己任。而在思想上，「西洋文化危機」也發生了，蘇俄的共產主義起來襲擊世界了。於是中國人過去遭遇「中國文化危機」者，至是遭遇一個「二重的文化危機」。我們缺乏獨立解決中國問題之能力，所以思想界的急進西化派因失望於西方而轉向俄化，共黨也便成立了。統一畢竟是國民要求。民國十六、七年後，中國也有了初步的統一。然共黨破壞於內，日本則磨刀霍霍於外，決不許中國能够統一建設，並且從九一八起，步步向中國作軍事進攻。世界各國除美國對中國關心外，其他大抵樂於看見日本的擴張，蘇俄尤其等待渾水摸魚的機會。此時一般的國民有一種無形的要求，即要求對日一戰，可是有形的主張則非如此。

有形的意見中，首先是西化派，許多英美留學的大學教授們。他們說，中國問題並非由於帝國主義之侵略，而是由於自己的罪過，由於自己「不現代化」。這主張在九一八後由陳恭祿和蔣廷黻等現代史之書加以系統化，認為鴉片戰爭並非英國責任，認為琦善主和為是，

甚至凡不甘對外屈服之主張，皆目爲「士大夫之高調」。這種論調，在抗戰以後依然爲許多人公開的或不公開的提出。此不僅直接不利於抗戰，亦間接有利於共黨。

其次是俄化派的中國共產黨。他們過去曾高唱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他們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唯有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到了國共分裂以後，他們根本不反帝了，而認爲必先打倒中國或國民黨。九一八以後，他們成立「蘇維埃」，即企圖使中國俄國化，並使他們自己成爲赤色軍閥。他們也與西化派一樣，認爲中國有一種「原罪」，即中國是「封建社會」。抗戰以後，他們以抗日爲幌子，實際上是爲蘇俄服務。

這兩派的人並非文盲，但他們却沒有不識字的老百姓對自己國家的忠心。這是中國悲劇之由來，也還是百年來洋人壓力的後果。我的這本小書，寫於民族生死大戰之中，亦針對這兩種外交觀念——西化派與俄化派而發。我認爲他們的錯誤（如果只說錯誤的話），乃根本不曾對世界歷史與文化作比較研究，不知中國與世界變化之由來，不知中國失敗之過程。他們根本無力由洋人的「觀念侵略」解放。西化派只知西洋文化之成就，而不知其勢利主義與弱點，因而奉西洋爲神明；俄化派能蔑視西洋，可是其本領又只能對蘇俄和馬列下跪。

拙著認中國禍亂由中國因閉關在知識和技術上落後而來，因此在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之

世受到西方列強侵略，並失去主動地位。於是一方面，洋人用其優勢造成了壓迫和擺布中國的機構和系統（不平等條約系統）；另一方面，我們在被壓迫狀態之下，在觀念亦失去自主能力之後，一切自救努力，一切內政，無不為外部形勢所決定，無不是被動的應付。結果，每一步西化即是進一步殖民地化。再由於列強競爭，中國成為一個國際問題——「遠東問題」；環繞中國的鬭爭，又引起國際局勢的變化。此變化的國際局勢又再塑造中國內部的形勢。於是中國陷入此一內外情勢之惡循環中，不能自拔，一切自強努力也跳不出洋人——西洋人、東洋人、北洋人——的掌心。昔日八股祿蠹固然不能應付列強，然為救國而求新知者，也只形成西化派俄化派兩種人物，一切媚外排外也只足以加深禍患。中國的命運真是太可憐了。拙著之根本觀點乃指出百年不幸，實由帝國主義政策與中國自身愚弱之合成的結果。在此過程中，我們固有種種愚蠢，然西方列強也決不聰明。那些戴高帽子的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切巧技陰謀，一切經營努力，只足以為日本侵略開路，而在當時已與中國同受日本侵略之禍了。

拙著極力主張的，是希望國人自主其命運。首先在精神上，其次在實質上跳出洋人的牢籠。以治標而言，在列強侵略變為日本之侵略，而此侵略無可廻避之時，唯有以全民族之鐵

血與其周旋到底；而治本之道，不是什麼現代化或共產主義，而是「以精神之獨立始，學術之獨立終」，求知識、技術之平等。有了平等的才能，也就能以平等力量，平等態度，對待各國。善者親善之，惡者制裁之。而鑒於當時勝利在望，平等新約成立足見西方已知今是而昨非，我們自當不念舊惡，平等合作，重建東亞以及世界之和平，亦必有此和平，始能從事平等國力之建設。

這是我在此書中簡單的冷靜的所分析，綜合與評論之要點，即在今日，我認為無須變更而且可說永遠適用的。

我寫成此書之時，是中國國運最光昌之一年，所以這本書對中國戰後形勢抱極大樂觀。此與後來事實相反，也許閱者認為此書對於蘇俄與中共禍心，估計不足。我很老實說，自一九三五年以來，我即了解蘇俄這個國家，其對外政策實繼沙俄之傳統，加上國際共黨之運用。日本的進攻，既已造成了蘇俄在亞洲的特殊地位；而中共又只是蘇俄的御用工具。不過在當時大敵當前之時，我不便明說，甚至不能明說。但對蘇俄不利中國之行為，未嘗諱其惡；而對列寧之褒語，亦欲斯大林勿存禍心。我沒有忽視斯大林的野心，所以對戰後中蘇關係避開不談，只希望西方各國尊重中國固有領土，尤其是滿蒙新疆西藏，並望西方國家勿再訂反